

生态经济评论

ShengTai JingJi PingLun

(第四辑)

主编 洪名勇

生态经济的制度基础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论都市农业的节能减排

中国边疆地区主导产业群研究

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贵阳诠释

传统、嬗变与重建：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试论

贵州农业潜在增长率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办

贵州省生态文明研究会协办

生态经济评论

第四辑

编委会主任 王红蕾

主 编 洪名勇

副 主 编 李晓红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经济评论. 第四辑/洪名勇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141-4237-2

I. ①生… II. ①洪… III. ①生态经济-文集

IV. ①F06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4382 号

责任编辑: 王长廷 袁 激

责任校对: 刘欣欣

版式设计: 齐 杰

责任印制: 邱 天

生态经济评论

第四辑

编委会主任 王红蕾

主 编 洪名勇

副 主 编 李晓红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1092 16 开 20.75 印张 390000 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4237-2 定价: 5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声 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卷 首 语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生态经济评论》第四辑如期面世。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改革大趋势下，在贵阳市连续主办4年“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并成功举办首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本土实践基础上，中心正式启动与贵州省生态文明研究会的全方位合作，研究会成为辑刊的协办单位。在以后的辑刊建设中，我们将更加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将更加关注贵阳生态文明建设本土经验和实践，不断扩大辑刊影响。

在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本辑《生态经济评论》聚焦生态产业发展研究、生态文明研究、生态文化·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及“三农”与贫困问题研究四个领域。

“生态产业发展研究”刊用11篇论文，洪名勇教授从外部性这一视角对生态经济的制度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山东大学的范玉波博士、魏建教授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循环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杨兴洪、吴方卫两位老师则探讨了都市农业的节能减排问题；梁双陆、徐杰对中国边疆地区主导产业群进行了系统思考；姚书杰、蒙丹老师则深入分析了云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问题，研究结果认为东南亚生物质能源作物替代种植、实施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战略和培育龙头企业等是云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文红、彭思涛、李亮等人基于现代化理论研究贵州遗产经济体系，并认为贵州乡村拥有丰富的山区传统生态技术与知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是发展遗产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将推动贵州实现生态现代化发展，实现“多彩贵州·绿色贵州生态梦”；刘超、朱满德则探讨了贵州省六盘水市茶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伍国勇和邵美婷分析了农业生态化发展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盘应福梳理了清代中后期清水江下游文斗苗寨的产业信贷方式；胡洁、崔海洋以贵州民族地区的生态旅游为研究对象，分析现存问题，总结了贵州省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模式；金磊、刘子菁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分析了旅游业对四川经济的影响。

“生态文明研究”刊用3篇文章。徐静研究员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贵阳诠释”为题,对《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贵阳行进录(2007~2012年)》做了述评,她认为该书不仅记录了贵阳市从2007年开启生态文明城市建设道路以来所迈出的坚实步伐,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表明贵阳的探索具象地诠释了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深刻内涵,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贵阳的透视性极强的窗口;龚慕霞探讨了黔桂农村环保习俗的现代价值,认为挖掘、传扬黔桂农村环保习俗,有利于应对当今农村严峻的生态环境的挑战,从传统环保习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可对生态文明建设起事半功倍之效;刘刚讨论了农民土地生态安全权益的保障,研究发现农民土地生态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的原因在于农民土地生态权益内容不清,权益意识与保护观念不强,保障主体不明,保障措施不到位,要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观念更新,从农村集体内部与外部来保障农民土地生态权益。

“生态文化·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收录6篇文章。杨军昌从传统、嬗变与重建的视角,讨论了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蔡承智、张文、梁颖对仡佬族原生态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廖桂蓉根据西藏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西藏青年人口的总量特征、受教育状况及经济活动状况,并提出为西藏青年,尤其是藏族青年的跨地区、跨省域流动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的政策建议。李明桥运用格罗斯曼(Grossman)的健康资本需求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新农合门诊补偿政策如何对农村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从短期上看,农户因新农合门诊补偿提高了劳动供给量,从而推动农村产量的增加;从长期上看,当农户根据新农合门诊补偿政策不断调整健康消费量和单位劳动物资资本存量,从而实现最优健康消费量和单位劳动最优资本存量,农户消费和生产决策最终处于新的均衡状态。李晓红、黄娜运用国家统计局2008年修订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对贵州省贵阳市和毕节市2011年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测算与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贵阳市与毕节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存在三个层次的不全面与不平衡,两市应该针对各自的短板加强建设。季飞采用“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分析模型对《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所涉及的政策标准与目标,可获得的资源与激励手段,组织间关系的性质,执行机构的特征,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执行人员的处置与回应六组变量分别作了分析,认为解决校车安全管理的关键还是应当严格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和提升现有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在寄宿制学校上学。

“‘三农’与贫困问题研究”刊发了6篇文章。熊德斌、屈玉琳、邓伦冰等对贵州省农业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研究,测算出贵州省2005~2015年的农业潜在增长率;张国安探讨了农村基层民主协商在破解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价值,认为在破解农

村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进程中,基层民主协商起着独特作用,它可以调动贫困家庭向贫困传递开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克服贫困文化的不良影响,促进社会公平,提高扶贫效率以及提高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成员的综合素质;申鹏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基于代际禀赋差异,对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安海燕运用博弈论,对农户与企业分成租赁合作关系的稳定进行了经济分析;孙红选取了威宁、务川、雷山和盘县这4个典型的贫困县对贵州省进行了县域能力贫困的比较研究;陶泓基于贵州省78个县农民收入的面板数据,对农民收入差距进行县域比较研究,研究表明,县域农民收入的县域绝对差距逐渐扩大,相对差距的变动幅度很小。

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1
生态经济的制度基础	洪名勇 3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范玉波 魏建 18
论都市农业的节能减排	杨兴洪 吴方卫 34
中国边疆地区主导产业群研究	梁双陆 徐杰 52
云南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姚书杰 蒙丹 74
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贵州遗产经济体系研究	但文红 彭思涛 李亮 83
贵州省六盘水市茶产业发展研究	刘超 朱满德 91
农业生态化发展中各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伍国勇 邵美婷 100
清代中后期清水江下游文斗苗寨的产业信贷方式 ——基于对“借当契”与“典契”的讨论	盘应福 111
贵州省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开发模式浅析	胡洁 崔海洋 121
旅游业对四川经济的影响分析：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模型	金磊 刘子菁 134
生态文明研究	147
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贵阳诠释 ——评《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贵阳行进录 (2007~2012年)》	徐静 149
黔桂农村环保习俗现代价值探究	龚慕霞 152
论农民土地生态安全权益的保障	刘刚 162
生态文化·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	171
传统、嬗变与重建：西南山地民族人口生态文化试论	杨军昌 173
仡佬族原生态文化：精神特质与审美心理	蔡承智 张文 梁颖 185
西藏青年人口状况及政策建议 ——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	廖桂蓉 200

农户健康投资与农村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新农合门诊补偿政策的视角	李明桥 211
贵阳市与毕节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测评比较分析	李晓红 黄 娜 223
西部地区《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执行的公共政策分析	季 飞 237
“三农”与贫困问题研究	251
贵州农业潜在增长率研究	熊德斌 屈玉琳 邓伦冰 253
论农村基层民主协商在破解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价值	张国安 262
基于代际禀赋差异的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	
——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	申 鹏 269
如何建立农户与企业稳定的合作关系	
——基于分成租赁的经济分析	安海燕 279
贵州省县域能力贫困比较研究	孙 红 291
贵州省农民收入县域比较研究	陶 泓 309

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生态经济的制度基础^{*}

洪名勇^{**}

【摘要】生态问题的直接表现是外部性问题，即人类行为存在的外部性，外部性主要有区域之间的外部性、流域之间的外部性、代际之间（时间之间）的外部性。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类行为为什么会有外部性，而且外部性为什么还会如此之普遍呢？在经济学的视野下，其根本原因为制度失效。制度失效使有关经济主体缺乏制度约束，外部性行为大行其道。

【关键词】生态经济 外部性 制度失效

一、生态问题的直接表现：人类行为外部性

生态问题之所以目前显得特别重要，一个引起大家关注的话题在于环境污染引发了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此时，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从表现上看，生态问题是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而环境污染之所以形成，从直接的表现形式看，就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洪名勇，2013）。

外部性这一概念及相关理论源自于马歇尔提出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在《经济学原理》这本经济学名著中，马歇尔（1994）指出：“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而且马歇尔对外部经济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认为“外部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从马歇尔之后，外部性不仅进入经济学研究的领域，而且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外部性也成为最难定义，讨论较多的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山区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路径与对策研究”[11JD790023]的阶段性成果，2013年洪名勇教授出版了《生态经济的制度逻辑》这一专著，应本刊之约，洪名勇教授将其第一章进行了缩写，现特刊于此。

^{**} 洪名勇（1965~），男，贵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

问题。不同的学者对外部性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一般地，我们可以对外部性进行以下分类：从外部性的影响效果来看，可以将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正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为其他经济主体带来好处或者使其效用或者福利增加，并且后者不用向前者付费。例如，私人花园的美景给过往邻居带来美的享受，但邻居不必付费。在这里，私人花园的主人管理花园的行为就产生了正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别的经济主体造成损害。又如，隔壁邻居在家唱卡拉 OK 时音响的音量太大影响了邻居的工作或者休息，这时，隔壁邻居唱卡拉 OK 的行为就给邻居带来了负外部性。从外部性的产生领域来看，外部性有生产的外部性与消费的外部性。生产的外部性就是由经济主体生产经营行为所导致的外部性，消费的外部性就是由消费者消费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性。从外部性产生的时间来看，外部性有代内外部性与代际外部性，代内外部性主要是指当代之间的外部性，而代际外部性主要指不同代人之间的外部性。从目前人类利用资源的情况来看，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淡水短缺等问题日益突出，这说明代际外部性正成为影响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从外部性的方向来看，外部性有单向的外部性与交互的外部性。单向的外部性是指一方为另一方所带来的外部性。例如，化工厂从上游排放废水导致下游渔场鱼产量的减少，而下游的渔场既没有给上游的化工厂带来正外部性，也没有产生负外部性，这时就称化工厂给渔场带来单向的外部性。大量外部性属于单向外部性。交互的外部性是指所有当事人都有权利接近某一资源并可以给彼此施加成本。例如，所有国家向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排放废弃物，破坏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产生了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就属于交互的外部性。除以上外部性之外，对外部性还有诸多的研究和分析，如竞争条件下的外部性与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稳定的外部性与不稳定的外部性、制度外部性与科技外部性（沈满洪、何灵巧，2002）、区域内外部与区域间的外部性，等等。

在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看来，外部性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于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庇古认为，边际私人净产值是指企业在生产中追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产值，边际社会净产值则从全社会来进行考察的，是指在生产中追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值。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并且，生产要素在各生产用途的边际社会净产值都相等，以及其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资源配置就处于最优状态。但是，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之间常常是不相等的，当边际社会净产值大于边际私人净产值时，企业或者经济主体的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有利的影响，这种有利的影响就称为“边际社会收益”；相反，边际社会净产值小于边际私人净产值时，企业或者经济主体的行为就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或者使社会受到损害，这种负面影响或

者损害，就称为“边际社会成本”。用庇古（1971）的话来讲，“在实现生活中，个人边际净生产与社会边际净生产常不一致”。庇古对外部性的分析是非常深入的，在庇古看来，外部性的本质是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的不一致。

在现实生活中，外部性随处可见。还记得十多年前，笔者以自己的遭遇写了一篇题为《生活在煤烟里的体验》的文章。文章讲述的是这样一则故事：“时至冬天，由于电费的昂贵及我们居住在集体宿舍对于用电的管制，因此，每家每户都要生火取暖做饭。我自己住在一幢三层楼房的顶楼，那是一幢以前单位的办公楼，没有烟道。生火取暖时每户人家都把自己的烟管伸出窗外。这样，楼下煤烟多往上冲跑进我的家里来。长此以往，危及家人的身体健康，不仅会支付较多的医疗费用，而且还会失去生病期间不能从事工作的一切收入。对于我自己来讲，负担了不应负担的成本。问题是，楼下的住户生火，获得了相应的好处，却将用煤生火取暖所产生的煤烟对人体的损害留给了楼上的住户。”笔者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则故事说明，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即楼下住户用煤生火取暖做饭的行为，由于其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气体污染了环境，同时，又损害了楼上住户的身体健康，楼上的住户不仅要支付更多的医疗费用，还要损失由于生病期间不能工作的收入。楼下住户的这种行为，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外部性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认为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问题就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外部性而造成的（洪名勇，1998）。

人类经济行为的外部性随处可见，尤其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更是如此。例如，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城市居民会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去郊区美丽的乡村旅游，呼吸新鲜空气，回归自然或者体验民族风情。但不少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经常随意丢弃生活垃圾，游客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负外部性行为。在贵阳市附近的贵定县有一个大家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叫金海雪山，每年4~5月，山上梨花盛开，犹如冬天的大雪满山，山下油菜花绽放，形成一片金黄色的世界，如此美景，人们称之为“金海雪山”。每当人们闲暇之时，会大批成群结伴来此体验同一时期出现的两种不同景致。但遗憾的是，不少游客在赏景之时，却常常随意乱丢垃圾，给美丽的金海雪山留下诸多的创伤。

再如企业活动中固体废物的排放、废水的排放、废气的排放行为，外出旅游中随手丢弃废物的行为，农户生产过程中施用化肥、农药的行为，生产过程中将塑料薄膜丢弃于田间的行为，等等。这些即是人类行为外部性的典型表现，同时，人类行为外部性的直接结果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导致生态问题，引发生态危机。

用于度量人类行为是否引发生态问题的一个有用方法是对行为进行算账，就像

企业的会计核算一样,看我们的行为是否会引发生态赤字。其计算公式为生态账户 = 生态足迹 - 生态承载力。如果生态账户大于零,则说明人类行为没有影响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人类行为是可持续的;如果生态账户小于零,则说明人类行为已经影响了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人类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对人类行为进行调整。所谓生态足迹,是一定区域范围内,能够持续地向一定人口提供他们消耗的所有资源和消纳他们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的土地和水体的总面积(Wackemal, Rees, 1997)。生态承载力是指区域内真正拥有的生物生产性空间的面积,反映了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的供给程度,是一种真实土地面积(刘东、封志明、杨艳昭, 2012)。生态承载力则表明在不影响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条件下,能够提供的面积。图1是利用有关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绘制的按照人均计算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两条线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其描述的基本情形大体上是一致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整体上处于生态盈余阶段,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由生态盈余开始走向生态赤字阶段。而且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和强化,两条曲线呈喇叭口状,说明生态赤字越来越严重,对此,图2就生态赤字所做的趋势图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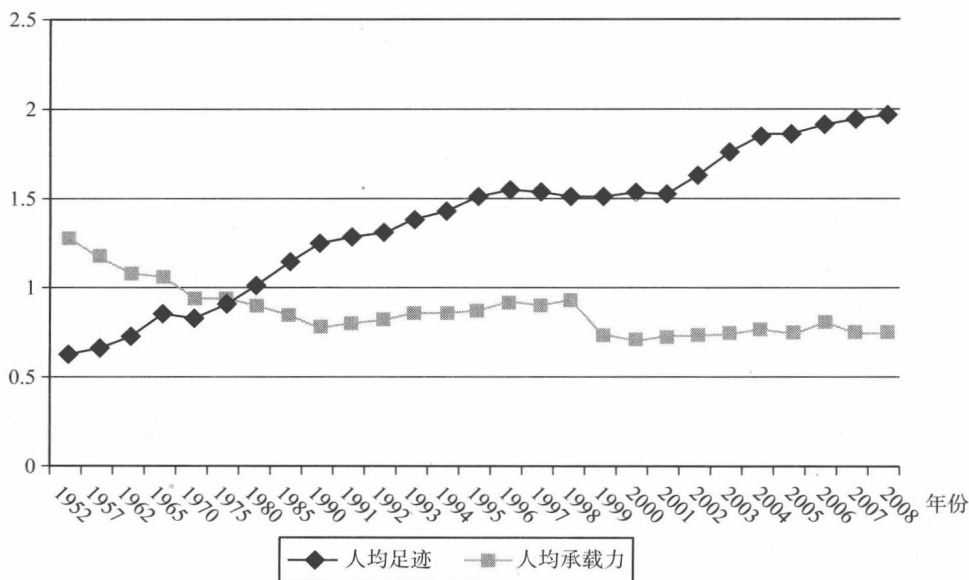


图1 1952~2008年中国生态足迹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刘建国(2011)资料进行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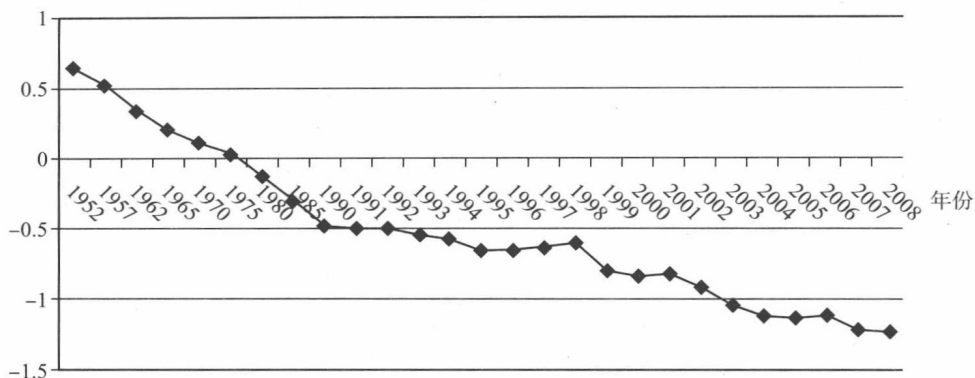


图2 1952~2008年中国人均生态账户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刘建国（2011）资料进行绘制。

二、外部性与生态问题：进一步的分析

前面的分析说明，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问题和生态赤字，其直接原因是人类行为的外部性。从现实生活来讲，外部性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实问题，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来看，外部性又是经济学研究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学术上对外部性如何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分析和研究，由于主体之间的外部性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外部性，并且大家均较为熟悉，这里主要对区域之间的外部性、流域之间的外部性、代际之间（时间之间）的外部性进行分析。

（一）区域之间的外部性与生态问题

在一些学者看来，马歇尔的外部性实质是一种空间外部性。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用来指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加总的规模经济，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本质是空间外部性，是企业或产业在空间接近的过程中产生的空间效应。马歇尔在讲外部规模经济时可能没有想到这可能是空间的外部性，或许，后来的经济学者是在马歇尔的启发下想到了空间外部性这一概念。按照有关学者的解释，假定在区域内经济活动单位的分布一定，每个经济单位都产生出影响该区域内其他经济活动单位的外部性，那么，每个经济活动单位也就受到该区域内所有其他经济活动单位所产生的外部性的综合作用，这种外部性的综合作用或总体的外部性就是空间外部性（胡鹏、覃成林，2011）。

我们知道，外部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经济主体或者行为主体的活动或者对其他

经济主体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有利于其他主体福利增进,我们称为正的外部性;相反如果损害了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福利,我们称这种外部性为负的外部性。虽然目前我们对区域外部性已经有一定认识,并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尤其是外溢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笔者认为,要从学理上认识区域外部性,必须解决“区域”的“人格化”问题。现下以财政收支体制为核心的分权改革,一方面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使地方政府手中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可以支配和进行再配置。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个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主体。从1980年起实施财政“分灶吃饭”的制度安排,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地方经济利益渐渐分明,地方政府竞争也由此而渐渐突显。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来源于中央政府其他政策鼓励的适度默认,中央政府越来越少地行使行政手段平调资源,使地方政府的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激励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动机,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分权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可以控制地方经济,建立新的企业,利用自筹资金进行投资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管理和重组地方企业(包括确定经理的剩余分享份额)。地方分权有效地促进了产权在不同级别政府间的界定,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成为其管辖区内经济资源控制者之一,这种制度促进了地方政府追求利润的积极性,还使得地方政府间彼此展开竞争(洪名勇,2005),从而使地方政府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人格化”倾向。

如果地方政府也是一个具有理性选择的“人”,那么,不同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由于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其收益和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选择一条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生态经济之路,从短期来看,收益与成本的比率是低的,即经济效益相对来讲比较低,这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实力、区域可以动用的财力等都是不利的,但这种选择对于相邻区域来讲是有好处的。相反,如果选择一条资源开采、粗放发展之路,这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由于存在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负外部性,对相邻区域来讲是有害的,但却能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增加区域的GDP总量,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可以动用的财力。对于前者来讲,多数地方政府的动力是不足的,因此,不少地方政府都选择了后一条经济发展之路,这使得要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落到实处更加困难。相反,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在国家对污染环境的产业和项目进行压缩之时,区域之间竞相寻找各种理由,向国家有关部门要高能耗、高污染的指标,以实现本区域经济在短期内的高速度发展、跨越式发展。

区域之间除了负的外部性之外,另一种较为重要的外部性就是正外部性,即是说一个区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例如,中国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生态防护林的建设就具有正外部性,又如贵州作为两江上游,对两江生态屏障的建设,等等。防护林建设和生态屏障的构筑,受益的不仅是本区域,更主要是这些